



海外学者视域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和实践研究

嵇明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研究。研究的着力点主要聚焦“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影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共同富裕等问题。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总体上带有非系统性、政策性和意识形态性等特点。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在不断壮大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上,通过正面宣传,有组织、有策略地积极引导国际舆论走向和话语风向转变,增强文化软实力;着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和国际认同;广泛开展中外学术对话,积极引导国际学术界关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点领域。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带一路”;意识形态;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425(2023)08-0011-11

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全球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逐渐提升,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制度等成为海外学界、智库等关注的焦点问题。正如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所指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中华文明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伟大礼物之一。”^[1]在此背景下,海外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从不同视角、学术背景、研究领域出发,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研究。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掌握海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和领域,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所处的国际舆论生态环境。本文拟对海外学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着力点、代表性观点等问题进行综述,进而总结出海外研究成果的主要特点以及带给我们的几点重要启示。

收稿日期:2022-06-09;**修回日期:**2023-08-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编译与研究”(21&ZD023)

作者简介:嵇明亮,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嵇明亮.海外学者视域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8):11-21.

Citation format:ZHUO Mingliang. A summary of overseas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23(8):11-21.

一、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着力点

当前,基于政治立场和立足点的不同,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与思考也呈现出积极与消极的两种评价。近年来,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及其影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共同富裕等问题。

(一) 海外学者对“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的研究

海外学者们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代表着一种崭新的全球治理观和中国责任论,具有全球意义。在海外学者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有效连接,是一种中国通过为世界发展作出贡献而引领全球发展的崭新模式,由此所产生的世界意义不能被低估。捷克科学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北思(Marek Hrubec)^[2]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开启了“全球化2.0”的序幕。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由英美等国开启的第一个版本的全球化进程目前正在运行中,不仅带来了世界各国的全球性互动,同时也引发了局部性的战争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近些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全球化模式,即“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不仅仅是对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和财政危机的回应,更是基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而提出的。他认为,这一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治理和未来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伊扎克·施克(Yitzhak Shichor)^[3]指出,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对西方国家全球治理格局的独特贡献,对欠发达国家也意义重大。

海外学者们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主张”。许多海外学者指出,“一带一路”本质上不同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方案,本身带有和平发展的属性,将助推全球的多极化发展进程。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学者卡利姆·西迪基(Kalim Siddiqui)^[4]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将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他指出,这不仅是一个加强贸易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区域经济项目,而且将对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合作产生更广泛的全球影响。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成功实施,那么人类历史从单极世界向日益多极化世界的转变进程将加速。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30年》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库恩认为,“中国一直致力于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建设和经济实力相符的基础设施方面,它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经验。因此,中国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完美人选,这一倡议也将让全世界受益”^[5]。

海外学者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当然有学者也强调了外交政策的朴素原理:一切国家外交政策必然以自身的国家利益为重。如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罗伯特·塔玛·利辛格(Robert Tama Lisinge)指出,2013年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外交政策的核心,反映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趋崛起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实力。这一多层次的、互联互通的大战略服务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地缘经济利益^[6]。在他看来,“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是满足中国自身发展,尤其是助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的。但是,满足自身的国家战略利益与引领世界经济复兴、带动整个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之间并不矛盾。正如德国智库席勒研究所主席兼创始人黑尔佳·策普·拉鲁什所指出的:“所有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可以共享中国巨大的发展成果。我想,这解释了为何中国模式如此吸引其他国家,为何各国这么热情地参与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模式的原因所在。”^[7]事实证明,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具体实施的确给许多国家带来了难得的“福利”,让许多国家受益。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许多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停滞的不利背景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务部的介绍,2020年上半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实现较快增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9.4%。这既是中国企业和有关国家企业共同克服疫情影响的结果,也对沿线国家恢复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8]。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为25%左右,是引领世界经济恢复的主要力量^[9]。

当然,从消极方面来看,国际上批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杂音还是一直存在的。综合海外相关研究文献和新闻报道,国际社会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有6个方面的误解:第一,“严重依赖中国症”,认为沿线国家会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中国,丧失了主权和独立性。第二,“中国大量获益论”,认为中国在此过程中会获得最大利益,影响其他参与国利益的实现。第三,“可持续发展目标缺乏论”,认为中国只顾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忽略对沿线国家长远规划的投入。第四,“债务陷阱论”,认为中国会通过大量对外贷款,胁迫他国政治,干涉别国内政。第五,“滋生腐败论”,宣传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会导致当地国政府的腐败行为。第六,“军事目的论”,认为中国将沿线投资的项目用途转变为军事目的。这些反面评价在西方主要媒体的渲染下,对我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施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对于这些误解,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予以驳斥和澄清。实际上,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主张和倡议的上述质疑和误解已经遭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和抵制。可以说,这些误解主要是由少数发达国家杜撰和渲染的,时至今日,西方一些国家依然固守冷战式思维和国强必霸的机械式逻辑,利用其长期掌握的国际话语权,在国际舆论上进行刻意渲染、诋毁中国形象和中国主张,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绑架国际舆论,压制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方案上升为全球共识,进而限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创的全球化进程在带动人类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也给全球发展带来了发展不平衡、全球性和局部战争频发、地区种族及民族和宗教的尖锐矛盾等。寄期望一种更加公平、更加普惠、更加和平的全球化,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追求。事实上,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主张”,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愿意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顺风车”。近年来,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立亚投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等主张也越来越深得人心。

(二) 海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研究

长期来看,西方一些学者往往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和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10]而一些实事求是的海外学者对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民主制度进行了正当性辩护。例如,法国学者福佩吉就曾撰文指出,法国学界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存在误解。他指出,民主不是中立的,而是与每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性质直接相关的。中国的民主体制在发展方向、未来目标和性质上更加具有民主性。在他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形式。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全面的民主^[11]。西班牙学者恩里克·凡胡尔认为,中国的民主改革在本质上是一种渐进式的民主化进程。他指出,“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的民主过渡已经开始了。但与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民主过渡不会出现明显的断裂点”,“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公民自由和参与程度也将逐步推进。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发现中国终于可以被看作民主社会了”^[12]。

可以说,这两种认识总体上符合事实。但在具体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过程中,仍然有部分海外学者对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权力交接和更替等进行主观臆想的“演绎式”“杜撰式”解读。这

些文章和观点误导了海外读者,干扰了海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正确判断。

实际上,我们当前所从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目标之一,我们的远大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现阶段从事一切工作的强大指引。资本主义民主道路不是人类历史的唯一选项,中国人民基于历史经验和基本国情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它真正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不断完善发展的内生动力。长期以来,基于政治立场的差异,西方一些学者这样那样的误解和偏见广泛存在于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的智库及研究报告中。通过分析来看,他们或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优势和进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是“正话反说”“混淆视听”,抑或是压根不理解中国却故步自封地以所谓“西方民主标准”来搞“一刀切”。

(三) 海外学者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影响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正确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两大奇迹”,既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实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1961 年至 1978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仅为 1.1%^[13]。根据 2020 年 1 月的消息,2019 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39%^[14]。自 2006 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连续 14 年稳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民族复兴的能力和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今天,在中美关系紧张、“新冷战论”“轻冷战论”“中美脱钩论”等言论粉墨登场的特殊背景下,当今全球治理似乎进入了新的历史转折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究竟将走向何方?中国将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海外学者纷纷指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时代”也已经来临。海外学者普遍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化和国际社会。国外部分学者指出,近些年来,中国承担起引领全球治理模式变革、国际组织改革的角色,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医疗救助,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表明中国正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甚至将引领未来的全球治理。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政治学教授伊·爱德华·扬(Yi Edward Yang)撰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主政的中国不仅继续塑造了中国政府的国际话语权,而且还提出了新的国际战略话语,力图重塑全球治理体系。这方面的工作主要体现在 3 个领域:气候变化、人权和互联网治理^[15]。

(四) 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长期以来,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分析和跟踪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进展。在海外学界,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数量庞大,汗牛充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的有力措施,这更引起了众多海外学者的关注。他们不仅关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与之前有何不同,也关注这一工作有什么样的新趋势。

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重要成果。2018 年 9 月,美国《中国政治学刊》出版专刊,研究“习近平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在专刊文章中,捷克科学院研究员林昂(Ondřej Klimeš)与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副教授马利楚(Maurizio Marinelli)共同撰文指出,自 1978 年后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思想和政治话语一直在中国政治制度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其第一任期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等一系列崭新的意识形态话语^[16],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创新成果。但是,他们认为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并没有出现范式上的转变,大部分是对毛泽东及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和政治话语的全面重申和创新,主要目的还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6]。此外,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撰文指出:“自2012年底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用铁腕纪律和民族主义使命感为该党重新注入活力,遏制令中共领导人担心可能削弱其执政合法性的腐败和不良官僚作风。”^[17]

海外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积极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来建构新时代的意识形态阵地。有海外学者指出,中国是文明古国,拥有璀璨的古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他们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和强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在今天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博士亚历山德拉·库巴特(Aleksandra Kubat)^[18]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应用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构和意识形态工作、国家治理模式和干部绩效考核等领域。

海外学者高度评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这一重大变化,海外学者尤为关注,发表了许多阐释性文章。海外学者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并写入党章是习近平执政第一任期加强党的理想信念和思想政治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英国牛津大学博士菲尔·恩特威斯尔(Phil Entwistle)^[19]就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党的队伍中可能出现的“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的现象,就决定改变这种情况,开始加强对队伍的管理、更新换代和意识形态工作,首先是在党的干部范围以内,进而拓展到国家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党章就是这些工作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五)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同富裕的研究

2021年8月17日,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20]随后,“共同富裕”再次引发海外学者的关注和热议,尤其是得到欧美国家相关学者、智库研究人员、记者等社会群体的高度关注,他们纷纷著文立说,向国际学界阐释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1. “共同富裕”概念的演变

2021年8月7日,美国学者大卫·班达尔斯基(David Bandurski)^[21]在China Media Project上发表《共同富裕史》(*A History of Common Prosperity*),作者“借助中国官方文献追溯了中国提出共同富裕的时间线,进而分析共同富裕概念在中国共产党话语史中的演变”^[22]。海外学者普遍认为,“共同富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不同时代其内涵的解释随着历史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海外学者们认为,对于“共同富裕”内涵的初次界定起源于毛泽东时代。学者们指出“共同富裕”最早出现在毛泽东时代^[21],1953年首次出现在党报《人民日报》的头条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共同富裕的道路”^[21]。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共同富裕”的内涵解释首次发生转变,被解释为适应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即邓小平所强调的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海外学者们指出,习近平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再次发生变化,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新的“主要社会矛盾”的一个关键选择。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是什么呢?许多欧美学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美国学者保罗·萨拉查(Paulo Salazar)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在《中国共同富裕:旧观念的新含义》一文中指出:“共同富裕的本质不是平均主义,而是通过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和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改善再分配机制和缩小收入不平等来改善人口的整体福祉。”^[23]

2. “共同富裕”主张有着丰厚的儒家文化基因

“共同富裕”这一理念将指导中国高质量发展。2022年3月30日,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高级讲师、《新南方经济学》(*New South Economics*)主编劳伦·约翰斯顿(Lauren Johnston)发表在《日本经济新闻》的一篇文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富裕”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有着丰厚的儒家文化基因,未来这一理念将指导中国高质量发展,从时间跨度上将持续到21世纪中叶^[24]。

二、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特点

总体上看,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认识成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也有些观点和论据有失严谨,缺乏现实的考察,主要原因或者局限于获取材料渠道的有限性,或者受困于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的偏见,许多论点和阐释有悖事实,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误读现象。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总体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非系统性

综上所述,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注的兴趣点是非常广泛的,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比如,还有零星的研究成果关注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足球发展^[25]、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26]、军队改革、教育改革等其他问题。但是,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往往缺乏整体性或系统性,以及长期跟踪式的研究,如对“四位一体”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等缺少系统研究的文章,呈现出重实践、轻理论的缺陷,没有很好地回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意义,没能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等重大理论问题。

(二) 政策性

从一些西方国家主流杂志的主编、编委和撰写队伍的构成来看,往往与政治呈现出高度融合的关联性,成为服务于本国国家利益的学术工具。例如,著名的胡佛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大都兼具“学者”和“政客”两种身份,履行着学术研究、决策咨询,甚至直接参与政府具体政策制定的多重职责。例如:胡佛研究所本身就是由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创办的;现任所长赖斯曾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国务卿;彼得·贝尔科维奇目前是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但他从2019年起开始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中国领导层监测》第一任主编爱丽丝·米勒曾在美国海军研究生学校、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过;撰稿作家柯庆生曾任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前副助理国务卿、容安澜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第一副主任和公共事务第一副助理国务卿,等等。

因此,海外学者的许多研究带有政策性研究的指向,是为西方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服务的。例如: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倡议(Atlantic Council's Asia Security Initiative)高级研究员德克斯特·迪夫·罗伯特(Dexter Tiff Roberts)的文章《什么是共同富裕,它将如何改变中国以及与世界的关系?》,本身就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和安全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总体上看,该报告认为中国实施共同富

裕对华盛顿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具有鲜明的政策性指向。通过对共同富裕的研究,该报告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应对的政策建议,包括鼓励与中国公司和企业家保持合作、支持在美国的公民社会团体、资助与中国相关的奖学金等。

(三) 意识形态性

海外许多学者的研究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部分海外学者按照集权主义、威权主义等西方固有理论框架来解读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体制,他们的文章中常常出现“垄断”“专制”“威权”等字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和各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置若罔闻。例如,学者比约恩·亚历山大·杜本(Björn Alexander Düben)就指出:“要使一个国家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其政治制度必须基于自由民主、法治和保护公民自由的原则。这些在中国都没有。”^[27]这一观点是西方学者从“威权主义”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典型误读。其背后的原因是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习惯于用所谓“民主标准”来搞全球“一刀切”,隐藏的逻辑是:只要不符合“美式民主”原则,就不是“民主”制度。这一整套做法构成了美国经济和军事霸权基础上的“政治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即用自己的“政治标准”或“思想意识”,来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指手画脚、横加指责,甚至不惜采用武力手段粗暴干涉他国内政。正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所指出的:“当前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全部政治、经济和信息能力都动员起来,投入抹黑和削弱中国的行动中。”^[28]

在学术研究中,西方学者必须正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道路的“特殊性”和“独创性”,摆脱“唯资本主义民主论”和资本主义媒体反面宣传的束缚,深刻反思资本主义民主道路本身的根本缺陷和不足,真正领会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谛”所在,做出独立的、准确的、忠实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判断。

三、总结与启示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海外学者的上述研究成果隶属于海外中共学的研究领域,具体来说是属于“海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外一批学者将“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和学术旨趣,包括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或者采取时事跟踪式的研究,或者进行比较性的研究,或者采取从历史到当代的分析范式,取得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成果,构成了海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初步基础。专著方面,例如凯瑞·布朗(Kerry Brown)的《习近平的执政之路》(2022年版)、季北慈(Bates Gill)的《敢于斗争: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全球主张》(2022年版)、阿尔弗雷德·L·陈(Alfred L. Chan)的《习近平:政治生涯、治理与领导权 1953—2018年》(2022年版)、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的《从反抗者到统治者: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2021年版)、克劳斯·穆尔哈恩(Klaus Mühlhahn)的《中国的现代化:从大清到习近平》(2020年版)、伊丽莎白·伊科诺米(Elizabeth Economy)的《第三次革命:习近平与中国新国家》(2018年版)、弗朗索瓦·布贡(François Bougon)的《习近平的思想深处》(2018年版)、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的《大国领导人习近平:中国领导人的国际视角》(2016年版)、玛诺拉扬·莫汉(Manoranjan Mohanty)的《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从毛泽东到习近平》(2014年版),等等。期刊论文方面的成果则更为丰富。事实上,海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作为一项崭新的研究课题,伴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开拓而不断丰富和完善,通过近1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时代显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为海外相关研究提供了现实素材来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系统总结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不仅是

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走向复兴的理论,而且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中国与21世纪的世界融为一体,中国的发展在造福本国人民的同时,也为世界发展进步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29],为世界各国人士所关注。正是在这一重要的时代背景下,虽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但海外学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我们应当采取批判的立场,谨慎地看待他们的研究成果。

从现实工作实践角度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时代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30],同时号召全党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三大主题,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和中国主张,阐释好中国特色,做好外宣工作。我们必须积极通过对国际舆论和话语体系的主动引导和建构,为我国构建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创设良好友善的发展环境。主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在不断壮大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上,通过正面宣传,有组织、有策略地积极引导国际舆论走向和话语风向转变,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31]历史实践表明,国际话语权是国际地位的外在呈现形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根本之策在于不断壮大国家的综合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系统设计和科学布局来掌握国际话语体系的制定权和引导能力。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断发展经济,壮大自身实力。其次,要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捷克马萨克里大学社会研究院米哈尔·弗莱格尔(Michal Fliegel)和兹德内克·克里兹(Zdeněk Kříž)在2020年2月撰文指出,北京正在通过多种渠道“讲好中国故事”,搭建国际合作平台,积极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全球大国形象。根据他们对软实力指数的统计来看,中国的国家形象在非洲和南美比较正面,在亚洲的形象比较复杂,而在欧洲和北美的国家形象分值较低^[32]。2021年6月29日,西班牙学者费利克斯·巴尔迪维索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史诗》的文章中指出:“中共现阶段的重要任务是将中国文化转化为自身软实力,以使其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更具吸引力。”^[33]前提要打破西方话语体系霸权,修订“自由”“民主”“人权”等话语体系的国际制定权和定义权,在国际社会上广泛呼吁摒弃“普世价值观”“资本市场万能论”“人权高于主权”等错误主张,反对“新干涉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排外主义”等错误论调,主张各国发展道路的自由选择权和国内政策自主制定权,积极引导国际舆论走向和话语风向转变。进而通过推进政府外交和党际外交相结合、官方互动和民间交流相呼应、线下展示与网上宣传相配合,善于利用国际互联网传播工具进行国家形象、政党形象、民族形象、人民形象、军队形象的宣传,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第二,着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和国际认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引领中国和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的最新总结,是指引全国人民不断取得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理论武器。它不仅属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提出的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正确理念指引和原则指向,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得到世界越来越多民众的关注、支持甚至期待。鉴于此,我们必须把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和国际

认同作为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传播体制机制,将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海外传播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作为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重大举措来推。我们必须积极对国际舆论和话语体系进行主动引导和建构,通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话语权。其次,不断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解决全球及地区性“难题”的能力,满足世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赢得国际民众的广泛支持。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与宣传新时代中国政府的国际贡献结合起来,更多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价值和世界意义,尤其是解决全球及地区性“难题”的能力。这些难题包括反对美国霸凌主义行径和殖民主义遗毒、国际脱贫减贫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等。再次,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全球治理格局的重要思想武器,在国际舞台上大力宣传和阐释,主动赢得国际舆论话语权。大力宣传全人类共同价值,打破西方话语体系霸权,修订“自由”“民主”等话语体系的美国定义权,在国际社会上广泛呼吁摒弃“普世价值”“资本市场万能论”等错误主张和论调。“以攻代守”,通过推进政府外交和党际外交相结合、官方互动和民间交流相呼应、线下展示与网上宣传相配合,善于利用国际互联网传播工具进行国家形象、政党形象、民族形象、人民形象、军队形象的宣传。同时,要加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四卷本的海外宣传和出版力度,加快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化传播和推介进程。

第三,广泛开展中外学术对话,积极引导国际学术界关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点领域,努力“讲好中国故事”“讲中国好故事”“续写中国新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34]由于国际上赞赏、支持和正面评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左翼专家学者不在少数,因此要严格区分各国“政客”与“学者”,广交国际左翼学界“朋友圈”、扩大左翼学者“朋友圈”,集中力量、发挥各自优势,在国外主流左翼网站和国外共产党官网、期刊、报纸、左翼出版社上开设、创办“中国”专栏、专刊、专题、专辑,引导国外学术界关心关注 1840 年以来中华民族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历史,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历程,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的探索与实践,积极抢占国际学术话语阵地。此外,要做好海外学术界的信息搜集和整理工作,对涉华热点议题进行专题式回应和讲解。加强对海外信息的动态分析和研判,摆脱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局面,力争实现“信息均衡”,努力创造“信息优势”。紧跟海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与各国自身发展和安全利益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并根据国际舆论环境的变化,及时进行专题式回应和讲解。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既要打好“防守反击战”,又要积极筹划“进攻式”地主动去答疑解惑,以正视听。

参考文献:

- [1] 中国青年网. 专访尤里·塔夫罗夫斯基:“中国共产党人,你们的事业是正确的!” [EB/OL]. (2021-05-13) [2022-07-10]. http://news.youth.cn/gj/202105/t20210513_12938161.htm.
- [2] HRUBEC M. From China's reform to the world's reform[J].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20, 10(2): 1-14.
- [3] YITZHAK S, BARNOUIN B, YU C G, et al. Recognition: China's long march to global integration[J]. *China Report*, 2020, 56(2): 167-181.

- [4] SIDDQUI K. One belt and one road, China's massive infrastructure project to boost trade and economy: An overview[J].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19, 9(2): 214-235.
- [5] 国际在线. 库恩: 中国将开辟新的全球治理模式[EB/OL]. (2017-10-23)[2022-07-10]. <http://news.cri.cn/20171023/2209a230-8873-98ea-309b-e1dab123d435.html>.
- [6] LISINGE R 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Africa's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and lessons[J].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Review*, 2020: 1-14.
- [7] 央广网. 德国学者: 中国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范例[EB/OL]. (2017-10-27)[2022-07-10]. http://news.cnr.cn/native/gd/20171027/t20171027_524003120.shtml.
- [8] 中国网. 商务部: 上半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实现较快增长[EB/OL]. (2020-07-31)[2022-07-10]. http://ydl.china.com.cn/2020-07/31/content_76332178.htm.
- [9] 求是网. 中国经济增长, 全球领先! [EB/OL]. (2022-02-08)[2022-07-10]. http://www.qstheory.cn/laigao/ycjx/2022-02/08/c_1128345252.htm.
- [10]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4.
- [11] FUYET P R C. Western perception of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viewpoints of the French left wing intellectuals and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J].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17, 7(1): 51-71.
- [12] 中国在线. 外媒: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关键问题[EB/OL]. (2011-04-27)[2022-07-10]. 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jiandang90nian/2011-04/27/content_12407118_2.htm.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70年中国跃居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EB/OL]. (2019-08-29)[2023-08-01].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8/29/content_5425698.htm.
- [14] 中国青年网. 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9%[EB/OL]. (2020-01-06)[2022-07-10]. http://news.youth.cn/gn/202001/t20200106_12161904.htm.
- [15] YANG Y E. China's strategic narratives in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under Xi Jinping[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8, 30(128): 299-313.
- [16] KLIMEŠ O, MARINELLI M. Introduction: Ideology, propaganda,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Xi Jinping era[J].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18, 23(3): 313-322.
- [17] 央广网. 外媒: 习近平“七一”讲话为中共开良方[EB/OL]. (2016-07-04)[2022-07-10]. http://news.cnr.cn/native/gd/20160704/t20160704_522577871.shtml.
- [18] KUBAT A. Morality as legitimacy under Xi Jinping: The political functionalit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J].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2018, 47(3): 47-86.
- [19] ENTWISTLE P. The Xi paradox: Reconfigured party power, long-term risks [J].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2018, 47(3): 3-16.
- [20] 求是网.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EB/OL]. (2021-10-15)[2023-07-10].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10/15/c_1127959365.htm.
- [21] CHINA MEDIA PROJECT. A History of Common Prosperity[EB/OL]. (2021-08-27)[2023-07-10]. <https://chinamediaproject.org/2021/08/27/a-history-of-common-prosperity/>.
- [22] 张潇爽. 近期海外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热点述评[J]. *国外理论动态*, 2022(1): 87-95.
- [23] CANDRIAM. China common prosperity: New meaning to an old idea[EB/OL]. (2021-10-08)[2023-07-10]. <https://www.candriam.com/en/professional/market-insights/topics/equities/china-common-prosperity-new-meaning-to-an-old-idea/>.
- [24] JOHNSTON L. What the west gets wrong about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 Xi Jinping's agenda is more Confucian than socialist[EB/OL]. (2022-03-30)[2023-07-10].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What-the-West-gets-wrong-about-China-s-common-prosperity>.
- [25] GÜNDOĞAN I, SONNTAG A. Chinese football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What do supporters think? [J]. *Journal of Current Chi-*

- nese Affairs,2019,47(1):103-141.
- [26] HAN H. Legal governance of NGOs in China under Xi Jinping:Reinforcing divide and rule[J].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8,26(3):390-409.
- [27] DÜBEN B A. Xi Jinping and the end of Chinese exceptionalism[J].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2020,67(2):111-128.
- [28] 环球网. 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中国共产党开辟通向未来之路[EB/OL]. (2021-07-03)[2022-07-10].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43myLYLjE0>.
- [29] 姜辉. 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世界意义[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1):4-10.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5.
- [31] 习近平.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0.
- [32] FLIEGEL M, KRÍŽ Z. Beijing-Style soft power: A different conceptualisation to the American coinage[J]. China Report,2020,56(1):1-18.
- [33] 中国青年报数字报. 外国专家文章:中共接续奋斗写就百年史诗[EB/OL]. (2021-07-01)[2022-07-10]. http://news.cyol.com/gb/articles/2021-07/01/content_n3v3oce3x.html.
- [3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99.

A summary of overseas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ZHUO Mingliang

(Academy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seas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role and influence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ideological work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common prosperity and other issu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of overseas scholars are generally non-systematic, policy oriented and ideological. The enlightenment to us is that, on the basis of continuously expanding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China should actively guide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s and the change of discourse in an organized and strategic way through positive propaganda so as to enhance cultural soft power. Overseas dissemin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will be promoted.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to carry out extensive academic dialogu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actively guide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key area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deology; common prosperity

(责任编辑 吴瑜)